

改革红利论

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探索

中原发展研究院课题组 著

中原发展研究院专家团队全面阐释改革红利的经典之作。

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讨论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本理论著作。



人民出版社

改革红利论

中原发展研究院课题组 著

 人民出版社

统 筹：书 元 广 伟

组 稿：张振明

责任编辑：刘敬文 刘彦青 安新文 郑牧野

版式设计：周方亚

封面设计：薛 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改革红利论：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探索 / 中原发展研究院课题组 著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2

ISBN 978-7-01-012973-0

I. ①改… II. ①中… III. ①中国经济—经济体制改革—研究
IV. ①F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308302 号

改革红利论

GAIGE HONGLI LUN

——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探索

中原发展研究院课题组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31.5

字数：385 千字 印数：0,001—5,000 册

ISBN 978-7-01-012973-0 定价：5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前 言

2013 年 11 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着眼“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全局，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开启了我国新一轮改革的壮丽征程。全会全面审视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发展大势，把握我国发展新要求和人民新期待，明确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要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改革开放 35 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人民生活面貌持续改善。2012 年中国 GDP 总量突破 50 万亿元人民币，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 GDP 超过 6000 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创造了“中国奇迹”。然而，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的高速增长，也累积了很多问题。金融危机以后，这些问题开始逐渐显露，经济下行压力越来越大。如何解决这些问题，重新激发经济增长内在活力，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达到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目标，是摆在国人面前不可回避的重大课题。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党中央、国务院统揽全局、审时度势，反复强调指出，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地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

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李克强总理为经济社会发展开出了三大药方，即向改革要红利、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和推进新型城镇化。毫无疑问，改革是根本，不管是推动经济转型升级还是推进新型城镇化，都必须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本质上都是改革问题。那么，究竟什么是红利、为什么要从改革要红利、改革为什么会产生红利、如何通过改革释放更多红利等一系列问题都有必要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加以澄清，以便凝聚改革共识，认清改革方向，冲破思想观念障碍，突破利益固化藩篱，不断面对挑战、解决前进道路上的问题。

围绕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中原发展研究院组建的二十多人专题研究经济体制改革的团队，在长期研究的基础上，从改革已经释放了哪些红利、现在还有哪些潜在的红利有待释放、如何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促进红利的进一步释放等问题切入，本着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一宗旨，重点从八个方面对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了理论探索：一是政企分开，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组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明确国有企业经营领域，强化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确立国有企业市场主体地位；二是弥补市场失灵，制定市场规则，监管市场运行，维护市场秩序，实施宏观调控，科学界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政府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更好地发挥作用；三是制定负面清单，放开准入限制，废除对非公有制经济各种形式的不合理规定，破除各种形式的行政垄断，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公开公平公正参与竞争；四是在水、电、油、气等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资源性领域，拆解竞争性环节，放开准入，建立合理的价格形成机制，加强监管，避免侵占、低效率和对消费者利益的

损害；五是改革户籍制度，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消除各种形式的区域壁垒，促进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要素自由流动；六是完善产权保护制度，确立公私财产均不可侵犯原则，农村土地在确权的基础上允许租赁、转让、抵押，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七是在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事权的基础上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八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加快实现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本书融入了每位团队成员的心血与付出。我们希望本书能成为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来讨论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本理论著作。但我们也深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博大精深，由于时间有限，难免消化不良。本书对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解和表达，一定有许多不全面、不到位的地方。敬请学界同行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耿明斋

2013年11月29日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1
第一节 什么是红利	1
第二节 人口红利和刘易斯拐点	3
第三节 改革为什么会有红利	7
第四节 为什么必须向改革要红利	10
第五节 从产生最大红利的领域突破	18
第二章 农业与农村改革红利	25
第一节 农业与农村改革回顾	25
第二节 农业与农村改革红利	35
第三节 深化农业与农村改革 促进红利进一步释放 ...	39
第三章 国有企业改革红利	48
第一节 国有企业改革的历程回顾	49
第二节 国有企业改革红利分析	60
第三节 国有企业未来的改革空间	67

第四节 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考	72
第四章 价格改革红利	83
第一节 双轨制	84
第二节 价格闯关	86
第三节 市场定价机制的持续推进	87
第四节 资源等公共产品的价格改革	89
第五节 估算价格改革红利的方法	92
第六节 深化价格改革的方向	94
第五章 金融改革红利	106
第一节 金融体制改革的历程	106
第二节 金融体制改革红利分析	117
第三节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方向	122
第四节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具体措施	126
第六章 投融资体制改革红利	133
第一节 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历程	133
第二节 投融资体制改革红利分析	141
第三节 投融资体制仍存在释放红利的空间	149
第四节 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方向	152
第七章 对外投资制度改革红利	161
第一节 我国对外投资政策变革的历程	161
第二节 对外投资政策改革红利分析	165

第三节	模型设计与数据的处理	171
第四节	实证检验结果	174
第五节	结论与深化改革展望	178
第八章	财政体制改革红利	181
第一节	财政体制变迁理论与财政体制改革依据	181
第二节	财政体制改革红利分析	187
第三节	财政体制改革的空间与趋势	211
第四节	财政体制改革的建议	218
第九章	收入分配改革红利与我国经济的 稳定持久增长	223
第一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历程与 收入分配差距变动	223
第二节	收入分配不平等不利于经济增长的 经验研究	234
第三节	收入分配与经济可持续增长互动关系的 理论分析	243
第四节	收入分配问题与当前的经济困境和 政策选择	254
第五节	收取“收入分配改革红利”的政策建议	261
第十章	新型城镇化红利	280
第一节	我国城乡关系演化过程与城镇化促进政策	280
第二节	我国城镇化水平的演进过程	290

第三节	城镇化的红利	296
第四节	新型城镇化及其对若干问题的认识	301
第五节	问题与新型城镇化改革方向	309
第十一章	建设用地制度改革红利	318
第一节	建设用地制度改革回顾	318
第二节	当前建设用地制度存在的问题	326
第三节	深化建设用地制度改革的思路和红利	335
第十二章	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红利	345
第一节	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回顾	345
第二节	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红利	350
第三节	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352
第四节	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思路	355
第十三章	医疗体制改革红利	360
第一节	医疗体制的内涵	360
第二节	我国医疗体制改革历程	364
第三节	医疗体制改革红利	380
第四节	深化医疗体制改革的方向	386
第十四章	文化改革红利	396
第一节	文化改革的含义	396
第二节	文化改革的进程	400
第三节	文化改革的红利	407

第四节	文化改革的问题	427
第五节	文化改革的方向	431
第六节	结论	437
第十五章	区域协调发展红利	442
第一节	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演进与实践历程	442
第二节	区域协调发展红利的界定与分析	449
第三节	区域协调发展红利持续释放的空间	457
第四节	增进区域协调发展红利的改革方向	471
第十六章	知识红利——中国未来发展的新红利	478
第一节	中国未来红利的展望——知识红利	479
第二节	知识红利与人口红利、资源红利的关系	482
第三节	知识红利的评价体系	485
第四节	知识红利的社会影响	488
第五节	知识红利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490
结 论		492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什么是红利

红利，英文为 bonus 或 extra dividend，其直接含义是公司分配给股东的资本利得。是公司税后利润提取公益金、公积金和各种奖励基金以后按资本份额进行分割的部分。体现的是资本被用于生产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增益或所获得的报酬。

红利的本质是经济活动的剩余。一般来说，这种剩余总是在公司的经营活动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因为公司是资本所有者针对某种产品或项目出资，购置设备，购买原材料，雇佣劳动力，组织生产或经营活动，销售产品或服务的经营性组织。其目的是使销售产品或服务得到的收入超过为生产这些产品或服务所进行的投入，从而获得剩余。在经济分析或经济核算中，投入或耗费即为成本，超过成本之后的剩余称为利润。利润中扣除税收以及用于职工福利的公益金和用于激励有突出贡献者个人或群体的奖励基金以后的部分，原则上即是可在投资者也就是股东之间进行分配的红利。但是，由于考虑公司发展对资本的需要，公司往往不会把全部属于股东的权益分配完，而是只分配其中的一部分，剩余的部分转为公积金，用于再投入。所以，红利往往只是投资人也就是股东可分配权益的一部分。

很多时候，人们往往将红利与股息相提并论。应该说，两者都是

股东权益的组成部分，差别在于股息是按资本的固定比例向投资人支付的，而红利相对于资本的比例总是不固定的，随公司盈利水平高低变动。实际上，在大多数情况下，股息和红利并不同时向同一类型的股东支付，股息支付的对象是追求稳定收益的优先股股东，红利支付的对象是愿意承担较大风险也追求较大收益的普通股股东。在不存在优先股类型的情况下，一般不会支付具有固定收益特点的股息，而只支付具有变动收益特点的红利。

作为经济活动的剩余，红利的根本源泉是技术进步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因为从根本上来说，经济活动过程是劳动者使用物质要素创造产品和劳务的过程，作为过程结果的产出物弥补物质消耗和满足劳动者的生存需要，超出劳动者生存需要的部分才是剩余，才有红利。这种剩余或红利的大小取决于由技术进步所决定的生产力水平。

但就企业这样的微观经济活动主体来说，红利源泉可以有多种。比如，可以是低价购进了设备和原材料而又高价卖出了产品，获取了更多的差价，也可以是向劳动者支付了较低的工资而增大了属于资本的利润；可以是引进了具有较高技术含量的先进设备而提高了效率，也可以是通过加强管理使得各种要素的配置更为合理而减少了浪费；可以是在生产过程中采用了更合理的分工体系从而减少了各生产环节之间转换所需要的时间，提高了时间利用效率，也可以是一系列约束人的行为的规则体系的改变使劳动者得到了更多的激励，等等。

最后，需再次强调我们所要表达的观点：资本利得只是红利的直接含义，其作为经济活动剩余的本质也只是在公司层面上得以集中体现。事实上，在经济活动剩余的意义上，人们很容易将对红利的认识和分析延伸到更广阔的经济活动领域。以至于在很多经济学家的思维体系中，红利就是经济在运作过程中的边际效益，是由于某些积极因素的存在而对经济发展起到的促进作用。在宏观层面，红利最终应该

表现为经济整体剩余的增加和社会财富即 GDP 的增长。相信，这是经济学界提出“改革红利论”并被新一届中央政府作为解决当前经济问题重要切入点的认知基础，也是我们在本著作中就经济活动各个侧面展开分析的逻辑基础。

第二节 人口红利和刘易斯拐点

红利的延伸含义是由于某种外部因素的影响所导致的经济活动规模扩大、效率提升和产出增加。在此意义上人们谈论最多的是“人口红利”和“改革红利”。

作为经济运行的外生变量，人口总量和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有着重大影响。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既是财富创造者，也是财富消耗者。作为生产者，人活动的结果是产出物品，作为消费者，人活动的结果是消耗物品。在社会发展的初期阶段，人口作为一个整体，其一定时期比如说一年内作为生产者所创造的物品和作为消费者所消耗的物品基本持平，没有剩余，也没有积累。但从结构来看，并不是所有人都具有生产者和消费者双重身份，而是只有一部分即处在劳动年龄阶段的人口具有生产者和消费者双重身份，另一部分即处在非劳动年龄阶段的儿童和老人只具有消费者一种身份。因此，即使在人口作为整体没有剩余的社会发展初期阶段，劳动人口的劳动产出物也必须超过自身的消费需求，以便能够有剩余满足非劳动人口的基本消费需要以维持他们的生计。从理论上说，人口红利就是人作为生产者所创造的产出物超出其作为消费者消耗的剩余。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人口作为整体其产出物仅够满足生存需求的初期阶段，人口作为整体没有红利，但劳动人口有红利。

随着技术进步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当劳动人口的产出物满足自身需要以外，不仅能够保证非劳动人口的生存需要，而且还有额外剩余的时候，就不仅是劳动人口有红利，而且是人口作为整体也有了红利。在这种情况下，人口红利——即劳动人口的产出物满足所有人口生存需要之外的剩余——的大小，不仅取决于劳动生产力水平，也取决于劳动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比例越大，其产出物满足自身需求后剩余的总量越大，该剩余中被非劳动人口消耗的部分越小，人口作为整体的剩余越大，红利也越大。这就是说，人口作为整体其红利的有无与大小，不仅取决于劳动生产力水平，更取决于劳动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为了简洁而又清晰地表达人口红利的内涵，学者们将衡量人口红利有无及其大小的标准浓缩为劳动人口“抚养比”。即用劳动人口——一般指15—59岁人口数——做分母，用非劳动人口——一般指15岁以前的未成年人和60岁以后的老人数——做分子，当分数值也就是抚养比达到某一临界点时，就被认为人口红利窗口开启，超过某一临界值时，则被认为人口红利窗口关闭^①。

总之，严格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应该就是劳动产出物超过劳动者自身消耗以后的剩余，一般人们所讨论的人口红利应该是劳动产出物超过全部人口——劳动人口和非劳动人口——消耗以后的剩余。人口红利的源泉：一是劳动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二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和劳

^① 根据河北大学王金营、杨磊两位的研究，我国1988年前后劳动人口总抚养比下降到50%以下，从而人口“机会窗口”开启，进入人口红利期，2007年劳动人口抚养比更是下降到了39.93%（见王金营、杨磊：《中国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实证》，《人口学刊》2010年第5期）。有学者将抚养比53%作为是否存在人口红利的量化标准，低于53%进入人口红利期，返回到53%以上人口红利消失（见陈友华：《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数量界定、经验观察与理论思考》，《人口研究》2006年第6期），蔡昉将劳动人口数量下降看成是人口红利消失的依据（见蔡昉：《人口红利消失之后》，《西部论丛》2010年第12期）。

动人口比例的增加。由于劳动生产力提高所带来的剩余增加属于更一般的现象，而人口红利问题更引人注意的焦点是人口总量与结构变动所带来的剩余增减，所以，人口红利研究就集中到了人口总量与结构变化对剩余多少的影响上。在生产水平一定的条件下，人口总量中劳动人口的增加之所以能够带来更多的剩余，直接的原因是未成年人和老人等非劳动人口比重减少，从而这部分人的净消耗减少。正如蔡昉所说，干的人多，吃的人少，剩余自然多，红利自然大。^①

实际上，人口红利之所以被提出来并且受人关注，是因为人们对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转型问题的关注。在研究和观察发展中国家从传统向现代转换的过程中，人们发现，除了技术进步、工业化与城镇化对农业要素的吸纳等因素所导致的效率提升、财富增长之外，人口总量和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也产生很大的影响。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人们自我意识的觉醒和生育观念的改变，发展中的社会到了一定阶段，人口出生率开始下降，劳动人口对未成年人的抚养系数会降低，社会剩余会增加，即所谓人口红利窗口开启。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人们生活质量的提升和医疗条件的改善，寿命延长，老年人口在人口总量当中比重会增大，劳动人口对老龄人口的抚养系数也会随之增大，社会剩余也会随之减少，人口红利相应减少，直到劳动人口抚养系数重新回到一个相对高的值，人口红利窗口也就随之关闭。出生率的下降也好，老年人寿命延长也好，都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换过程中的现象。所以，理论上人口红利作为劳动剩余或许是一种永恒存在，但就其经济分析的意义来说仅仅是发展中国家某一特定发展

^① 蔡昉说，“如果劳动年龄人口增长、人口抚养比下降，就会带来人口红利，反之就没有人口红利。过去相当长时间里，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人口抚养比一升一降，生之者众，食之者寡，我们得到了人口红利。”（见《人口红利拐点已现》，《人民日报》2013年1月28日）

阶段的现象。

人口红利对于经济增长具有加速度的作用，因为人口红利可以刺激储蓄，促进投资，增大社会资本的规模，提升劳均资本占有比率，从而提升劳动生产率，加快经济增长速度。

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家安德鲁·梅森最先在其论文中使用人口红利一词。哈佛大学教授大卫·布鲁姆(David E. Bloom)与杰佛瑞·威廉森(Jeffrey G. Williamson)将“中间大，两头小”的人口结构视为“人口机会窗口”或“人口红利”。他们认为，人口红利在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1998年，联合国人口基金在《世界人口现状(1998)》中正式使用人口红利一词，使人口红利这一概念逐渐为学界认同和使用。^①

讨论人口红利，不能不提到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重要概念，即“刘易斯拐点”。

与人口红利一样，刘易斯拐点也是经济学家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与现代化转型过程所提出的概念。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一般具有“二元结构”特征，即传统的农业部门和现代的工业部门并存。在传统农业部门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以至于其劳动的边际收益可能为零，这对工业部门来说，意味着劳动力存在着无限供给的状况。随着工业部门的发展，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会以仅够维持生存需要的低工资进入非农产业，创造大量剩余，加速其资本积累，并促进工业部门的快速增长。一旦工业部门的扩张把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吸纳净尽，其进一步扩张和对劳动力需求的进一步增加，就必然导致工资水平上涨。因此，工资水平上涨是劳动力由无限供给转向短

^① 钟水映、李魁：《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综述》，《人口与经济》2009年第3期。